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 父亲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后
父亲李天佑与林彪 | 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女儿张元生讲述父亲的遭遇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家国往事

历史真相揭秘 政治人物兴衰 焦点事件深析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作家文摘 / 家国往事

20周年珍藏本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国往事 / 《作家文摘》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3.9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ISBN 978-7-5143-1676-6

I. ①家… II. ①作… III. ①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②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7=7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563号

家国往事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编 者 《作家文摘》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676-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政坛风雨

-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002
- 我所知道的彭真……005
-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010
- 江青秘书回忆：我在 1966 年……016
- 我所知道的冀朝鼎……020
- 我知道的杨献珍……024

将帅传奇

- 父亲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后……030
- 女儿眼中的父亲刘伯承……035
- 记忆中的父亲陈毅……038
- 岁寒心——回忆我的父亲黄克诚……042
- 开国上将陈士榘的传奇经历……054
- 父亲李天佑与林彪……059
- 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064
- 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女儿张元生讲述父亲的遭遇……070
- 父亲钟伟……074

父辈往昔

- 我的伯父周恩来……080
-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086
- 无大爱，何以言割舍——写在父亲乌兰夫百年诞辰之际……093

秦铁：我的父亲博古·····	097
我的公公邵力子·····	101
父亲廖承志与母亲经普椿挚爱一生·····	105
建人叔叔的婚姻·····	111
“阿丕”叔叔·····	118
“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回忆祖父刘文辉·····	123
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的一段往事·····	127
我的父亲潘光旦·····	131
我的叔叔乔冠华·····	135
父亲徐韬和江青共事的那些年·····	138
父亲焦菊隐与石评梅、林素珊·····	143
我与继母廖静文·····	148
我所知道的《海瑞罢官》与吴晗伯伯的劫难·····	153
公公杜宣和他的女朋友们·····	157
特殊年代的亲情——资中筠谈父亲母亲·····	162
我的父亲冯友兰·····	167
父亲是知识分子·····	171
松柏岁寒心——写在父亲陈白尘百年诞辰之际·····	176
父亲张伯驹的婚姻·····	180
父女如影·····	184

母爱无疆

在母亲丁玲遭批判的日子里·····	192
母亲杨沫·····	199
我的母亲上官云珠：不尽往事红尘里·····	203
回忆母亲丁一岚·····	209

情同手足

- 忆大哥秦基伟……214
- 姐姐眼里的王元化……218
- 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221
- 长空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6 周年……226

师友之间

- 想起郭小川……238
- 留在太平湖的记忆……242
-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252
- 我所知道的周谷城先生……257
- 追忆故友金山和孙维世……261
- 一路之隔，两家悲欢——忆马寅初先生……266
- 兰畦之路……270
- 回忆世交孙炳文一家……273
- 追忆沈从文与萧乾……277

私人叙述

- 我和陈昌浩共同生活的日子……284
- 曾志回忆：我与陶铸……289
- 在延安和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295
- 我用亲情唤回杨帆……300
- 我与沙飞的悲欢离合……304
- 钻石婚杂忆……309
- 我和艾青的故事……313
- 风雨落花——忆梁白波……318
- 我与梁思成……322

政坛风雨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 于光远 ·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认真细致踏实；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

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作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是很大的。

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可是华国锋却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方面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头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也不必说那些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作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

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为“英明领袖”。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着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时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代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代就有的现象。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我认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的。

（《作家文摘》2011年总第1446期，摘自2011年5月14日人民网）

我所知道的彭真

· 李 莉 ·

特别随和的人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知道彭真是晋察冀边区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兼任市长。

我第一次和彭真谈话是在 1953 年冬。我的丈夫李琪在那年秋天调到彭真身边当政治秘书。有一个星期天，李琪来电话说，有事不能回家，要我到他那儿去。李琪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两间房里，彭真住在旁边一个院子里，两个院子相通。我当时正怀孕，午饭后午睡，李琪将我叫醒，说：彭真和洁清夫妇要来看你，已来过一次了，不让叫醒你，说过两个小时后再来，时间快到了，快起来吧。我赶快起来，洗了脸，心急速地跳着，心想该说什么话呀！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方工作，很少和中央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话。

彭真和洁清推门进来，我们请他们坐下，寒暄几句。

彭真说：“听口音你是晋中人吧。”

“是，我是交城人。”

他说：山西建党之人是高君宇，在陶然亭公园有高君宇的墓碑，你看过吧？他是静乐县人，就在交城旁边。你一定去过。

说到我熟悉的事，我的心情慢慢就不紧张了。

那时正在贯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彭真问我：大家对白面定量供应，棉花定量供应有什么反映？

我说：大家反映很好。我们机关有的同志为了执行定量指标都推迟买粮食。

彭真说：我和李琪都是晋南人，爱吃馒头，晋中人爱吃面条，进城后我们吃米多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吃什么都一样。吃得饱，生活安定。气氛非常融洽。

彭真是特别随和的人。他见到下面的干部，就虚心调查。

彭真关心干部，每年春节都要我们和赵鹏飞（彭真办公室主任）两家到他那儿看电影，据说是苏联送给中国领导人的小型电影机。他们派人去育英小学接儿子傅锐时，也把我的儿子海渊一起接回来。女儿海文有时到他爸爸那里，李琪不在，洁清留下吃了饭送回家。他们夫妇关心干部，平易近人。

天坛讲话，事后知道不妥马上纠正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一件事，这也是作为中央领导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1958年“大跃进”，到处放卫星，高指标。一天，北京市在天坛公园召开万人大会。这时郊委已撤销，改为农林局，我做林业工作，参加了这个大会。在大会上，彭真讲：我们亩产小麦要超过1000斤。当时亩产也就是二三百斤。没过两天，市委传下话说：彭真说了，他讲的指标不算数，他定的指标高了，要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定。彭真作为中央领导能检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延安时“抢救运动”搞过头了，他也有责任。

1961年，国家遇到灾害，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彭真到怀柔听汇报，彭真住在怀柔，亲自到西三村、一渡河等大队了解情况，首先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不在公共食堂吃饭的问题，解散了食堂；缩小公社范围，基本是一个乡一个社，确立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管理体制；确定恢复自留地。这些政

策一公布，马上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全北京市郊区都闻风而动，一夜之间解散食堂，事不过夜，真是大快人心。群众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北京农村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走出了低谷，这与彭真在怀柔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正确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批斗会上，彭真理直气壮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我也参加过陪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彭真说话口音、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质问他，他依理回答，造反派无理，就以打倒的口号来掩盖他们的无理和无能。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问：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说：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说：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

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布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彭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提出要比学赶帮超？要超过大寨，是反对农业学大寨。（1965年彭真曾提出比学赶帮超，要超大寨。）

彭真答：比学赶帮超，先进应该再先进，落后可以赶先进，搞好是可以超先进的，这有什么不对？要互相学习，一浪推一浪。事物不是静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超，大寨怎么不可以超！

.....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彭真有理有据的答复，对我是激励。这些老革命，他们的毅力，他们坚持真理的态度，是无与伦比的。

从流放地回到北京，彭真的眼圈红了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要回来了。

彭真回来，北京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大家特别高兴。那天下午，我们不到两点就到了飞机场，一直等到5点多钟，天黑了，飞机才来。彭真和大家一一握手，彭真的眼圈都红了。

出来后，司机告诉我，他在外面数了有100多辆车。如一个车上坐着3~4个人，估计得有几百人，最少也有100多人。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彭真回来的那年春节，我恢复原职。有一天我正在农林局开会，彭真的秘书来电话说：彭真要你来一趟。我去了前门饭店后，丁一岚也在。彭真说：“你们（指我和丁一岚）两个命运相同（我的丈夫和丁一岚的丈夫都是在‘文革’初期被迫害死的）。我担心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

彭真一只耳朵背，他就让我和丁一岚轮流坐在他耳朵不背的那边同他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我说：他（指李琪）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我讲起1975年为李琪作结论时，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说，李琪的错误主要是跟着彭真反对江青，材料就这么厚。我说：你写上。他说就不用写了，还是轻点好。

这时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敢写！也不能写！”然后他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

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 51 岁就走了。”他眼圈都红了，越说越难过。

我怕他太难过，那时他已是 77 岁的老人了，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

彭真说：“过去就过去了吗？！”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彭真非常尊敬毛主席

彭真很讲义气，爱护下级。1980 年春节，彭真请我们全家到他家去，在他家吃饭。那时，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去他家的。回来时彭真风趣地说，车子队先行。他送走我们才回去。

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位子上退下后，1994 年春节，我们在北京的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大家坐了一圈围着他。他讲的中心意思是怎样看待毛主席。他说：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他是非常尊敬毛主席的。我们从他家出来后，有人讲：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先拿彭真开刀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非常坚定。正如在挨斗时，他回答造反派时说的：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他一生的实践做到了这点。从大局出发，从原则出发，这种坚定的党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家文摘》2008 年总第 1118 期，摘自《党史博览》2008 年第 2 期）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 张玉凤 ·

她曾经给伟人当过秘书，那时她默默无闻；现在她是一个普通公民，仍然默默无闻。属于她的，只有那些埋在心底的珍贵记忆……

——编者

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主席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主席掌管文书。

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

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

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主席多年，工作配合默契，毛主席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他再回来。可是他终究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

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副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的。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

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运筹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细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我工作周密细心，要么就是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毛主席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

我很荣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就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的工作是在尽善尽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机要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当我来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主席。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知识。

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主席身体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记得1971年春，毛主席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转